

数字中国的传播学理论表述与实践路径

连水兴 陈经伟

摘要:传播学的本土化自引进之初即是中国学界的核心命题与使命任务,传播学的发展与实践也始终绕不开中西语境的二元互构。通过梳理既往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文章认为需要跳脱出“本土路径—世界体系”与“世界视野—本土路径”两种探索理路,意识到数字中国所催生的新传播语境与历史使命,进而在“去陌生化”的视野中开辟“再陌生化”的向度,以数字中国为背景谱写学科本土化的实践。首先,在厘清数字地球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廓清数字中国的结构意涵,建构数字世界的中国样本。其次,明晰数字中国中传播学的两重“基底性”定位,把握数字时代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人民性核心,主动推进从学科互涉到学科共振。最后,以数字时代中人的境况为轴心,考察数字中国传播语境下“物质基底”“文化基底”“治理基底”的三位一体,也就成为探索“中国路径”、建构“中国话语”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数字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6-0073-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XW106)

经过 40 年来的发展,中国的传播学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学科及教育体系,并为中国经济转型、文化传播、社会治理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专业视野与实践助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时至今日,由于先天性的影响,中国传播学依然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苦苦挣扎。传统源自西方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对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已表现出明显的能力不足,这也成为禁锢该学科自身发展的潜在因素。因此,我们如何在数字中国的语境下,重塑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科本体合法性,在跨文化、跨国别、跨种族的转移中寻找其实现本土化“自适应”的路径,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然,也恰恰是在这个时代,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数字中国建设图景为传播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本文试图在中西传播学对话的语境中,探讨数字中国的传播学理论表述与实践路径。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从西学东渐到再陌生化

如果说欧洲哲学思想是传播学的“古老源流”,那么“战争驱动”便是美国传播学科建制的直接动力。^[1]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学科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生产着控制与规训的话语体系并通过同一性设置其边界。^[2]“学科”具有“教学科目”“学问分支”“学术组织”三层基本内涵^[3],学科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皆有其特定的背景线索。于是,对今天的中国传播学来说,建基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控制、舆论战争等研究传统的现代传播学便需要省思:在经历西学东渐后,如何重新认识、定位、塑造自身?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构建适应于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社会建设等现实需求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从而稳固学科合法性?

(一) 学科谱系、发展困境与自省视野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8 年 7 月,郑北渭主编改革开放后第一本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开始在国内介绍传播学。同年 10 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

访问中国。随后,1982年,被誉为传播学科创始人的美国学者施拉姆访华,并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这次会议形成了中国学界对待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始,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始追寻一条结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1984年,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在中国出版,进一步掀起了西学东渐式的转译高潮。^[4]中西传播学对话的序幕由此铺开。从知识社会学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知识的生产与扩散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行为,影响着社会事实的形成,需要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相应的透视与回应。当代传播学体系作为“舶来品”,便有其无法忽视的西方意识形态血统。以美国“传统学派”为代表的“功能—行为”范式,经过二战时期的一系列研究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以施拉姆、贝雷尔森为首的学术共同体,并完成了学科建制。基于此,传统学派成了“完完全全美国本土化的产物”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5]可以看到,传播学的中国化自初始便与西方产生了深刻的联结。甚至可以说,施拉姆的“中国传播学的破冰之旅”直接为中国带来了美国传播学。徐耀魁就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离不开施拉姆划定的圈子。甚至研究者所写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对施拉姆学说的转述或阐释。^[6]因而,中国传播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西方学术话语和知识谱系的烙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陷入一种焦灼状态,原因有二:其一,学界在理论吸收方面没有大的进展,此时期虽有批判理论,诸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的引入,但是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未能切实指导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其二,由于中国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传播学的实用工具理性倾向占据研究主导,这一时期的探索更多停留在实践、实证的层面,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7]这二者互为因果,奠定了4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调。而究其本质,是因为彼时中国与西方在媒介技术发展及其普及程度方面相差甚远,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基础产生了某种撕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传播学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苏醒,并逐渐摆脱介绍、引用的研究模式,开始探索更具主体意识的认知方式,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框架等方面着力建构“中国话语”的传播学体系。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传播学的“西学东渐”的问题确实表现出明显的疑虑。随着西方冷战文献资料的不断解密、研究和译介,中国学者发现,作为中国传播学的“传道者”“启蒙者”的施拉姆,同时也是一名“冷战专家”,传播学的学科化隐藏着建构“民主新秩序”的意图。^[8]于是,施拉姆形象的转折代表着中国传播学重新审视西方语境下学科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播学体系建构的“结构性贫困”^[9]。中国现代传播学体系发展至今,若想真正摆脱西方语境的桎梏,则需要厘清学科源头与隐忧的基础上进行“再陌生化”的认识。

(二)“再陌生化”的探索脉络与现实基础

“再陌生化”的方法,要求以一种基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新视野,即在中国转型社会的历史性背景下,基于具体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探索传播学理论中主体认同、文化脉络、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等问题的连续性与合法性。换言之,无论是沿袭自西方的经验的、功能的传统主导范式,还是上述学者们积极探索的本土化成果,都需要被放置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进行考察。此种考察的关键核心在于:区分学科史与知识生产二者间的关系向度,同时做到泾渭分明却又紧密联系,进而正确认识学科来源与本土化问题,摒弃先入为主的西方语境,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实践性的学科体系。从“认识你自己”到“成为你自己”,其中不仅涉及对本土化命题的辩证与去伪存真,更蕴含着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方法论。

中国的社会学在本土化问题上较之传播学具有更多历史的先天性。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到80年代的“本土化”再到现今社会学对自身“美国化”的警觉^[10],尽管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论争并不像社会学那样系统,但也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两类:“本土路径—世界体系”与“世界视野—本土探索”。“本土路径—世界体系”主要以本土具有特殊性的学术资源为对象,意图

寻求世界传播学体系中的话语权。如有学者提出要“从华夏文化的源点出发,探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路径”^[11];也有学者认为,要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维度上扎根本土、中外勾联”^[12]。“世界视野—本土探索”则主张以世界性的知识谱系为目的,有意识地建构本土学科的全球效度。如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知识介入中国语境的过程中,应在注重“内部普遍性”的调和的同时,寻求“多元普遍性”的存在^[13];也有学者指出本质困境是问题的缺失,并倡导以全球化视野和多元方法去探求问题的真相^[14]。林林总总的观点争鸣展现了中国传播学试图找寻自身语义场,发展出具有中国气象的本土传播学体系的努力。

可以看到,本土化问题的核心离不开在比较视野中展开的自省自查,所以其本质上是对知识“跨情境效度”的追问。恰如胡翼青所言:美国传播学实质上是大众心理学的知识工具,沿用至今已导致其自身想象力的衰竭^[15]。而中国传播学带着走出西学东渐的问题意识,站在时代变局中,若要实现自身的创新与超越,就必须面对“更为宏大而根本的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的长期而艰巨的改造”^[16]。于是,随着数字化的全球铺展以及中国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崛起,本文在数字中国的语境中,提出以下设想,如果中国媒介技术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都能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世界,那么,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是否有可能摆脱传统西方话语体系的牵制,建构起一种具有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知识谱系呢?在这种问题意识下,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无疑会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凸显出来。

二、数字中国:一种新传播语境的产生及其价值构成

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数字中国是一片亟待探明的问题域。作为一个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17],它标志着中国传播学者如何进行自我认知、理论建构以及学科实践的研究路径,可以说,在渡过西学东渐阶段且主体意识危机并起的今天,只有真正扎根数字中国的经验场域,才能筑牢自身学科体系,最终服务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建设。

(一)从数字地球到数字中国:数字世界的中国样本

数字中国的概念脱胎自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于1998年1月发表的演说《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我们所居住的星球》。所谓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就是“运用GPS、网络技术、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对地球甚至外星球进行全面数字化、信息化”^[18]。彼时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应对气候变化,响应参与者大多为地球、地质、测绘等研究领域人士。而随着全球数字化建设的进程愈演愈烈,各国都在其自身的数字化过程探索本土化的建构方式和理论体系,数字中国应运而生。数字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指的是中国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是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运动。^[19]当然,一个概念的产生和挪用,总是要面对历史演化、语境迁移、在地适用性等诸多问题,于是,从原初的概念语境到今天数字中国的体系建构,需要考量概念旅行的变动及其本土化发展。

数字地球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化转型为概念外延,同时指涉围绕数字化的未来想象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社会治理、制度建构,天然具有“政治/学术”“实践/治理”“经济/技术”“文化/观念”的多元意涵,这也成为衍生与支撑“数字国别”建设发展的基点。

首先,技术霸权、数字殖民、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等问题的演绎生成不容忽视。数字地球的推进需要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对地理的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完成从采集到应用的技术链条,这些数据不仅包含普遍意义上的地表信息,还囊括城市、人口、自然资源等全方位、历时性、多价值尺度的数据库,必然涉及数据主权、信息共享、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敏感问题。在此意义上,数据的采集、分配、应用、归属权、合法性等都需要探明。

其次,数字地球是人类对物理与虚拟空间更深层次的占有形态,它隐喻着一个全面数字化的生活世界与系统运行逻辑,需要谨慎对待其带来文化形态冲突、更迭甚至文化殖民。恰如勒菲弗(Henri Lefebvre)所指出:“今天,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而文化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20],通过嵌入数字公域,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

化体系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以“全球范本”为权力表征,以“普世价值”为实践遵循,使身份认同、数字参与、文化消费等走向同质化、碎片化、单向化。

最后,数字地球预示着一个无远弗届的全球治理框架,掌握数字地球就等于掌握了现代社会的“最高控制点”^[21]。新一轮技术浪潮下,借助 BIGANT 技术体系,即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交互技术(Interactivity)、游戏(Game)、人工智能(AI)、网络运算(Network)、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六大技术,数字地球不断延伸概念领域,不仅在环境观测、资源勘探、生态系统监测等自然层面施展拳脚,还介入数字城市、数字小区、数字政府、电子商务等社会层面,成为包罗万象的基石概念,进而充分探索数字信息资源潜能,深刻改变社会治理模式。

自1998年数字地球概念问世,次年12月,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即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强调数字地球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呼吁国际合作与跨界共赢,充分显示中国对数字地球愿景的前瞻性关注与重视。紧接着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首先采纳了有关专家关于“数字福建”建设的建议和方案,明确提出“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的建设目标,由此开启福建信息化大规模建设进程。^[22]后续,相继有十多个省份展开了各自的数字化工程。数字中国的发展,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演化。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数字中国的概念,并发布了数字中国的建设纲领,数字中国建设的大幕由此拉开。正如何毅亭指出的:中国是“世界伟大样本”,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23]。这一“中国样本说”与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论述的“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遥相呼应^[24],展示了以中国为本体和研究原点的历史任务与使命担当。

(二) 基底性:数字中国中的传播学定位

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需要在数字化建设的浪潮中,以数字中国为方法进行传播理论体系的创新。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学科范式的演进更迭一般经历这样一种过程:前科学与前范式—常规科学与范式—反常—科学危机—革命与革命科学—新范式与新的常规科学。^[25]作为一门具有多元研究传统的学科,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往往随着社会发展、技术演进而“反常”“危机”“革命”的间隙中更迭。“范式”一词,与“科学共同体”密不可分。中国传播学的科学共同体,便可在数字中国的语境中区分出两重意涵。其一,是“数字”,即在全球数字化与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数字转型进程的共时历程。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都需要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媒介普及给出的新命题。这些命题在带来社会转型与业态革新的同时,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适与阵痛,亟待重新审视,锚定位置以及合理应用。其二,是“中国”,即建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与文化脉络上的多维度认同,包括政治观念、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何以认识“中国”?诚如任剑涛所言:“作为一般词汇的‘中国’,是一个内嵌着家国一体的理想政治、传统帝国的氏族统治体制与现代国家的形式建制与实质体系诸因素的辞藻。”^[26]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源流加上其与近代世界历史曲折的接续过程共同造就了现今复杂的现实语境,如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交往方式。也就是说,若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数字化所内蕴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倾向而罔顾中国本土的文化、社会、政治情景,便会丢了追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可能。

数字中国的两重意涵互为支撑,是中国传播学在数字化时代谋求自身发展与学科合法性建设的“一体两面”。首先,在数字中国的偏正结构中,“数字”是用以修饰“中国”的表征性描述。在此意义上,作为主语的“中国”并不意味着遵循自身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中心主义,而是强调某种与西方话语霸权分道扬镳的立场,致力于在“中国梦”“伟大复兴”“命运共同体”等纲领思想的共同指引下,完成“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建构。其次,中国社会特有的多重历史性要素,也赋予数字化进程特殊意涵与要求。如有学者指出:人的自由与解放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27],中国所涵盖的框架性国家的性质塑造着中国人的种种日常实践形式^[28]。可以说,“国家”的概念中介了中国人与生活世界的交

往。那么,遵循一种实践向度与学术取向,便需要在城乡迁移、代际交往、礼俗承继等现实问题的对话中撷取数字时代的“人民性”,把“被掩盖与边缘化的国家理论中的普通人”^[28]带向数字时代的具体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与“中国”在时空认知、价值归属、逻辑取径上同源一体,数字中国研究逻辑的合法性与价值导向便是顺理成章。

遵循上述意涵的指引,中国传播学理应在数字中国的新语境中探索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如果说在引入和接受西方传播学传统的早期,中国传播学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学术的“复刻品”,那么,在数字地球与数字中国的建设背景下,中国传播学便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斯蒂芬·查菲(Steven H. Chaffee)等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大众传播的终结”的预言^[29];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则认为传播学范式已经化身成为两类,即大众传播范式和新范式^[30]。由此,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在重重危机中呼之欲出,而部分中国学者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比如,吴飞认为,“数字媒体技术、大众媒体、电子媒体的直接内涵及其对当代数字社会的压倒性影响,可以想象一个无纸化的,所有媒体都在数字平台上制造和使用的文明。”^[31]黄升民等在分析媒介演化路径时指出,技术与时代背景融合,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正是奔涌的数字化时代浪潮,而技术潮既是大背景也是引爆剂。^[32]喻国明认为5G“两高两低”的特点会造成传播领域的革命,且是一种“换道行驶”的转变。^[33]方兴东等人则预测,2030年代将是大众智能传播的确立阶段,而智能传播的崛起,标志着数字传播格局的基本形成。^[34]

可见,在社会变革与数字媒介技术腾飞的背景下,“数字传播”无疑是未来传播学发展的关键词,而技术环境的日新月异,也在召唤新的理论研究路径。正如胡正荣等人所言,中国引进和吸收来自西方传播学范式研究的理论已经长达数十年,但当下中国传播领域的发展现实,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变化,需要在尊重历史发展和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符合全球化中国的传播学范式^[35],实现中国传播学在数字时代的“换道超车”。

显然,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而言,数字革命正促逼着一种对传播实践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考察^[36]。而知识在介入现实建构的过程中得以焕发生命力,以一种实践的方法论重新考察现实问题有助于跨过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转而回归理论建设本身。媒介作为形塑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结构性变量要素,通过生成关系与连接,催化交往与行动,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地位。正如许煜所洞见的:“一方面,我们目睹人类成为数码物本身,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会意识到,人类正在与机器相结合。”^[37]在这样的转移中,人类与数码物交融、“递归”(recursion),突破虚实维度,共同以行动者的姿态建构人的生活世界。

那么,中国传播学能为数字中国的发展提供什么?从元问题出发,它的终极目标指向“人类关系”的新形态:在“对话与沟通”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建构秩序。^[38]从现实症候来看,在媒介逻辑不断演绎延伸下,技术物不仅塑造着人类生存环境,更是人们观照自我,认识世界,实践活动的“中介”与“透镜”。本文将此种特质称为传播学之于人类社会的“基底性”。

所谓“基底”的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关于“基底—质料—潜能”的阐述:基底构成了质料的原初材料,指向事物本身属性的与实体的生成,其哲学意涵,在于作为“未被规定的”而使对象显现并标示潜能^[39]。而传播学的“基底性”具有两重内涵:一方面,于个体来说,传播学着眼于人的基本境况,从自我到世界,从媒介素养到批判意识,此种包罗万象的研究视域使其自身具有天然的“基底性”。另一方面,于社会来看,以人的基本境况为轴心,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技术创新,最终都要回返到具体的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恰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性”不渝追求的表达,从而赋予中国传播学之于中国社会的“基底性”。

在新一代智能技术风起云涌的今天,人工智能以颠覆性姿态跃上历史潮头,看见这些生成中的历史节点与技术奇点,将生发于中国土地的经验脉络转化为能够指导实践、可供借鉴的理论体系,并为全人类标示未来路径与交往形态,便是中国传播学理应追寻的学科“基底性”。

(三) 学科共振:数字中国的价值构成

回溯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可以发现其来源往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理论杂交^[40],如基于控制论传统而产生的“创新—扩散”“使用与满足”“有限传播”等理论,而作为一门“十字路口”学科,传播学“学科互涉”的本质特性从未停止演化。有学者指出,传播学发展至今天,政治学、社会学、商学、社会心理学、家庭研究、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语言学、电影广播和电视学与传播学的联系最为密切。^[41]事实上,无论是施拉姆在学科建制体系中确立的多学科源头,还是自《领域的躁动》(*The Ferment of the Field*)专刊起众学者对学科正当性的焦虑与反思,传播学试图通过对话、批判来划定并扩张知识边界的尝试不曾间断。^[42]

种种证据表明,传播学肇始于多元血脉的交融,又从纷繁复杂的动荡环境中汲取养分,建构人类对“作为生存环境的媒介体系”^[43]的认知,而这么来看,“出身”的焦虑源自仍未明晰自身学科定位。试想,若是以“如何通过影响人的个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38]为元问题,以双重“基底性”建构自身,又怎会陷入学科合法性困境?换言之,应在充分认识自身学科特质的基础上,从学科互涉走向“学科共振”,进而使对话不仅停留在引介与挪用,而是尝试在元问题的视野中,激发不同知识体系间的共振共鸣。

于是,在“基底性”的指引下,以人的境况为轴心,考察具体的人在数字时代中种种生存方式的转换,是数字中国语境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路径。一方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群众路线”的现代表达,将传播研究落到实践与实处中,意味着对人的主体性的标亮与诠释。此种“国家在场”的意识生成,是中国社会行动的总体性指南。以中国应对疾病防治的历史进程为例,从1952年兴起的,由国家话语主导的不同时期的爱国健康卫生运动^[44],到媒介在促进“群防群治”共识的形成与疫苗接种的集体行动方面发挥着建构性作用^[45],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人民主体性轴线。另一方面,这是以世界历史为背景,以世界交往为前提,构造起不同主体的间性关系网络。此种主体间性的建构,要求各主体间遵循平等的对话哲学,在共同价值的观念体系中摒弃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共赢。

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普遍共时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数字中国传播体系的建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有其使命任务的历史连续性与合法性。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46]。以此为背景,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中国本土化传播研究的重心自然超越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元悖反以及全球学术共同体间的竞争思维,而旨在将中国式现代化巨大变迁的现实转化为可供世界接受、参考、应用的知识与经验,换言之,数字中国的体系建构内生于且指涉数字全球的变动与发展,其生成的命脉,在于真切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经验。

当下,数字媒介的应用渗入生活的细枝末节,成为生活世界系统性运转理所当然的基质。而对被媒介所裹挟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便需要持有一种“基底”思维,以“数字时代的人民性”为起点,由下至上地在理论中重返现实关切,贯通数字时代的学科纵深。于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即是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包的媒介物,考察其作为建构生活世界的基础设施所展现的媒介性质。同时,拥抱其作为变革性力量的可能性。紧接着,人类文化模式与社会形态随之转变,感知、体验、认同、调用,人与文化的关系处在动态的历时性自反中。在此种自反中,“中国之治”作为中介调和的系统性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此种顺承逻辑从数字传播范式革命的语境出发,遵循新唯物主义将“人一物”关系导向的间性范畴,从而将数字时代的命题复现至对物质、文化与其治理的问题域。于是,数字中国传播研究的路径,便涵盖数字时代中具有基底属性的物质、文化与治理。

本文在此意义上,划分了数字中国传播研究的三种取径:作为底层支撑物质基底、作为社会结构的文化基底与作为实践框架的治理基底。这三者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在层级递进且相互作用的整体中发挥作用。如图1所示,在“基底”的视野中,物质、文化与治理两两作用,构成了数字中国“三重基底”的价值递进。而以治理基底作为顶部的价值回归,即是呼应数字中国传播研究命脉的应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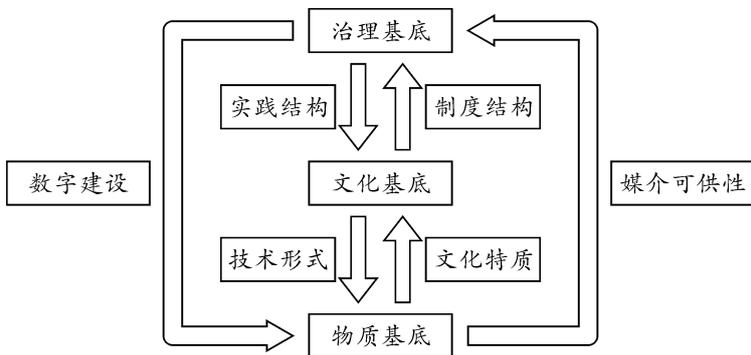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中国的三重基底关系图

三、“三位一体”：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中国传播理论

数字中国作为一种顶层纲领、中层问题域以及方法论基底而发挥能动,它不仅指涉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更旨在开辟中国与全球彼此鉴照、互联共通的网络空间。概言之,对中国传播学来说,数字中国意在回应当下中国传播学自身的主体焦虑,通过考察中国当下发展阶段的三重基底,建构自下而上的理论体系,澄明中国传播实践及其世界性的历史经验。

(一) 数字中国与传播研究的物质基底

近年来传播学科遭遇的“物质性转向”为审视人类与媒介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视角,此种转向本身即从根本上重构了过往经验主义范式的根基,使研究者有可能在文本与字节的指数级增长中,重新重视作为基底的物质性媒介,重新反思其在传播生态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与数字中国政策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不谋而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是以5G、物联网、工业物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47],正以悄然无声却又翻覆天地的方式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束开荣认为:新基建涉及的多个细分领域都是以互联网为运作基础的社会技术体系,可被统称为“互联网基础设施”(internet infrastructure)^[48]。从横亘万里的海底电缆,到游弋天地的数字信号,数字中国的建设离不开这些新基建的铺展,所以数字中国的传播研究同样需要将这些物质力量纳入研究视野。

彼得斯(John Peters)曾提出“基础设施主义”(infrastructuralism),指出该主义遵循“关注各种环境、微小的差异、门禁和针眼”的教义,而基础设施是一种“后勤型媒介”(logistical media),一方面“让人忘记其存在”,另一方面也发挥着“组织和校对方向的功能”,能够“整合人事,勾连万物”。彼得斯的这一概念将对新基建的认识导向一种“遮蔽—解蔽”的启发视角,呼唤人们“从对隐蔽环境毫无意识的状态中苏醒过来”。^[4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基础设施的物质媒介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功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保障而“存在”与“运作”,而这两种状态也对应了基础设施的“物质性”与“社会性”“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这两组关于基础设施的重要维度。前者揭示物质基础的双重特性,强调其社会系统的运作、社会结构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联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后者凸显了数字基础设施介入现代生活,化身为日常中或显见,或隐蔽的重要存在,在人们媒介实践的前台与后台间不断地降临与回返。

刘海龙对彼得斯关于基础设施划分的两种类型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硬基础设施包括电网、道路、大坝、光纤电缆、网络服务器等,软基础设施包括如历法、时钟、数字、文字、物流系统、文档或图书馆分类系统、网络协议、搜索引擎等。^[49]本文在重审这些物质实在的同时,更增加了一层“人”的存在维度,将视野放置在人与物质的共生、演进、实践的生态主义观念中,将人的生存境况同物的存有境况进行接洽、绑定、融合。于是,在以“人—物”为本体的前提下,作为物质存在的基础设施被赋予动

态的活性特征,也正是王继周所说的:“以‘人的实践’为中介‘物’,‘物质’才可能走向‘物质性’”。^[50]所以,数字时代,对人的媒介实践的考察,离不开对物的参与、协作与整合的探寻。同时,当我们在审视物的存在与功用时,也需要将其放置在“人一物”交往共生的社会语境和全球国际政治权力流动的向度中。以新基建的产业链为例,首先在硬件设备层面,存在诸如5G技术的基站、光纤光缆,人工智能的芯片、传感器,甚至特高压的变压器、抗压器,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等这些庞大的物质支撑体系,需要着眼这些新型物质基础设施的后台运作,重视其在非人行动者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嵌入以及控制论意义上的以“人一物”关系为中心建立起的系统回路。其次,在核心技术层面,还有以平台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等多元组成。一方面,它们作为集成数据、呈现界面、提供服务的中介,处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动态变换中,另一方面,也在这个过程中隐匿为“不可见”的基础设施,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背景。

媒介作为“技术起源”(technogenesis),已成为一种人类的“生命环境”(environment for life)^[51]。于是,建基于庞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社会走向了平台化,而数字劳动的生存方式由此诞生。数字劳动是适应社会转型对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劳动形式,在推动社会资源高效整合,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灵活就业岗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相应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数字中国的语境中,对“人一物”关系的考察便落脚于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以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外卖员为例,在平台媒介的支持下,他们的工作呈现出“超级流动”^[52]、“时间套利”^[53]与身体的基础设施化^[54]等特点,这是平台界面、数据、算法等“软基础设施”与其背后一整套“硬基础设施”协同运作的结果。这些实践表征着数字中国的某种内涵与形态,浓缩着数字基础设施“双重反身性”的特征:一方面,人的需求框定了物的发展轨迹与呈现结果,另一方面,由物设定的交互规则也形塑了人际关系的新样态,“决定了我们的处境”^[55]。

当然,正如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言: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与相应社会目的进行结合的产物^[56]。发生于数字中国现实的无数微观实践的基本单元汇聚,构成了数字中国的时代面貌。所以,我们也需要看到,数字基础设施的本质并非价值无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场域不仅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也在全球化的今天成为政治博弈空间。中国在“国家—产业”联动机制的引导与助推下,正一步步展开“博弈式的国际融合”,从技术的自主创新到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接轨、参与,这一过程充满了意识形态与利益的角力。^[57]

今天,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8],势必推动全社会的数字化加速转型。也即是在此种背景下,数字中国的传播研究更需要借助一种“基础设施主义”,在物的迷藏中探索人与基础设施更深的联结,在人与物的互动中瞥见更开阔的未来。

(二) 数字媒介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基底

文化与符号的表征形式具有与物质技术的对应关联性,从数字中国的媒介现状观照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便需要进行相应的脉络溯源与现实适配。数字媒介的兴起催生了网络社会的诞生,并重构了本土与全球的空间结构与秩序,同时改变了时间体验与赋值的尺度、方式,以此为背景,数字时代的文化行为更导致了媒介伦理、媒介素养、数字鸿沟等领域的问题。有媒介地理学理论强调,“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是日常的生活的实践,不同的空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经验、意义、进程。”^[59]所以,将广袤的中国大地放置以地理区隔为界分文化维度中考察,可以发现诸如燕赵文化、中原文化、闽台文化等都是依凭“在地知识”而生成的文化地图。于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空间成为文化生产的现实基底,与人们的文化实践同构。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曾将技术物视为“人与自然的中介”^[60],在此意义上,可见的数字化媒介与被遮蔽的数字基础设施共同作为中间物,中介了人的文化体验,而作为生活空间的自然环境表征着一种“在地”的分类系统,成为塑造自我认同与文化实践的认知工具,打造出数字中国的文化基底。今天,数字媒介不再仅仅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而存在,而是成为表达、沟通、共享文化的生活方式,要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61],必然需要借助数字媒介的能动性,实现媒介物质性的传播力与文化基底的感染力的耦合,而这也是数字中国传播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命题。

如上所述,以人与数码物的融合为表征的时代特征是整个人类文明所共享的普遍性趋势,如何把这样的普遍性问题转化为属于中国本土的特殊性问题,则要回归地方的视角、回归到诞生于土地上的人事物,才能纵览全局,实现真正的本土化。有学者认为:“数字媒介极大地推动了更多根植于本地的更加个人化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62]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独特的乡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与传统体系。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看是乡土的^[63],而在现代化背景下,“乡土性”的特征需要进行重审。传统的乡土社会以其稳定的组织结构而得以存续,在长达数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历经口语、文字、印刷时代的媒介变迁,形成了自洽的媒介经验体系,转而过渡到以电话、电视、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介。这一媒介进程揭示了媒介史与社会史共时同构的演化逻辑。所以,正如欧阳静指出:构成乡土中国的“乡土性”已发生质变,由“人情”与“礼治”为内核的“乡土性”蜕变成了由“理”“力”“法”相互混合和交杂的“结构混乱”。“乡土中国”已不再“乡土”,而是处于“结构混乱”的状态。^[64]这样的“混乱”是在不断解离与重构、固化与流变、祛魅与返源的动态的、弥散的、双向的现代化进程中被实现的,然而“混乱”的状态并不意味着文化基底的析解与退隐,而恰恰说明在数字中国的进程中,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连续统所迸发的生命活力,更展现了在结构性转型的历史性阶段中,中华文化通过汲取自身深厚的思想底蕴而进行的自组织与自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65]从乡土社会到现代中国,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经历着诸多流转、碰撞与融合,转而表现出一种复杂状态,这是在现代化、全球化、媒介化等普遍趋势下的必然反应,而中国文化基底的韧性便在其中凸显。比如,城市化造成了文化融合与人口流动,但对中国人来说,“乡土或家乡情结对中国人社会行动具有很强的引导性”,使他们“避免成为城市化洪流中的原子化个体”。^[66]正如邵培仁等所言:文化本土性包含了自我指涉与他者认知两重意义。^[67]它不仅影响了自我身份、价值认定、行为模式的建构,同时也形塑了个人社会化与交往方式。所以,与其说“地方”是一系列结构性要素综合作用所呈现的结果,毋宁说是作为能动的变量而参与感知与变动的进程中。在此意义上,所谓的文化基底,便是中国人进行生活实践的底色,其构成了中国人关于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认知与想象,同时也演化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信息传播模式。数字时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溯源至与传统乡土文化的联结中,在“地方”的想象中得以复现。西方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我们其实都是持不同文化的土著”。^[68]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基底的某种共同特征。以此视角观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数字中国旨在通过信息化浪潮建设面向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同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目标,这正是数字媒介与文化基底相互作用,和合共生的生动实践。

(三) 数字中国与数字实践的治理基底

同作为物质支撑的数字基础设施与作为文明载体的乡土文化基底一样,数字媒介已成为影响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动态力量,并在嵌入社会的过程中催生出相应的媒介逻辑,使社会整体朝向愈发深刻的“深度媒介化”发展。那么不可避免的,数字治理的问题意识便产生了。这里的“数字治理”,具有“框架”与“规制”的两重指涉:前者包括数字中国语境中多元行动者的数字实践和以人民性为核心的社会本质;后者在宏观的国家层面,引导与统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实践路径。借由媒介化的趋势,数字媒介在成长为显性的社会力量的同时,也逐渐将自身嵌入社会整体的底层逻辑中,型构了社会整体的结构特征,进而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组成。正如王琛元所述: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自然渠道,还是特定语境中表征社会、参与社会的制度化形式”^[69]。于是,数字中国的传播研究体系

理应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媒介逻辑和组织逻辑,从而建构一种稳固、自洽的底层治理制度。

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通过将实践定义为“一系列主客观组成元素的集合体”来整合个体与整体的行动框架,从而将二元性问题化约为一元的辩证^[70]。在数字中国的现实操演中,如前述,“国家”的概念高度在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乡土文化结构中,而且与其说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自为地发挥着总体性作用,不如说是中国人民主动将“国家”接纳进日常生活中的核心位置。以此来理解中国人的数字实践与数字中国的关系,那么治理基底便具有天然的自洽性。而所谓的治理基底,实质上指的就是社会行动者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运用数字媒介适应数字时代的一种自我治理与自我实现,而这种治理与实现,很大程度上嵌入数字中国的传播话语体系中。

首先,数字媒介在与中国社会耦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逻辑自洽,在这种自洽中,“中国之治”的数字实践不断丰满着自身的话语向度。这里的多元行动者,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资本、社会个体等,他们组织着自身的社会能动,共同编织着数字中国的治理基底。如在中国乡村振兴政策的统领下,地方政府、民间小资本与民间社会三者进行有机协作与融合,以“助农扶贫+电商直播”的方式,建构地方性的数字实践,以此对抗平台垄断地位的钳制。其间,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着重要联结。^[71]又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间在封闭状态下,通过社交媒体自发组织的社区团购行为。“团长”作为拥有一定社会资源的组织者,建立了中心化的采购机制,这恰是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现代表征。^[72]再如,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心,有别于西方国家将社区置于国家立场的对位^[73]。基于数字媒介高效实时的互联互通,治理基底呈现出层级的上下融通,信息的上传下达与治理的自下而上,在此意义上,“基层党建”“城乡社区治理”“基层群众自治”都是数字中国生动的治理实践与话语体系。

在中国的思想长河中,对“治理”的追求占据历史思潮的主流,甚至提倡“无为”也是为了更好地“治”。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深入到了当前数字中国的媒介治理建设中。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媒介系统呈现出市场至上与消费文化的特点^[74],但从数字中国的治理基底出发,中国的数字环境便具有了超越的潜质。正如泰瑞·弗卢(Terry Flew)所言:“在采纳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推进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化。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也一直是弱势的力量。”^[75]数字媒介在当今社会的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从“渠道”到“结构”,从“工具”到“互型”的角色演化,这是传播媒介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数字化环境嬗变的一种呼应。“良法善治,民之所向”,数字中国在构建现行的媒介治理体系中,深入贯彻着“人本”与“法治”的思想精华。在传播制度建设层面,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媒介化进程的政策转型,比如以媒介融合为核心的中央厨房、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清朗”为目标的网络空间整顿行动等,都是数字中国在媒介化进程中的治理实践。

四、结语

吉登斯在阐述现代实践观时指出:“无论是主体的构建,还是社会客体的构建,其根基都在于紧密渗入时空中的社会实践。”^[76]在讨论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路径时,有学者甚至指明有以下六条进路:验证主义、寻根主义、融合主义、问题主义、改良主义和创新主义。^[12]在此,我们认为在传播学科面临转型的今天,不妨坚持一种“实践主义”,在实践中创新、学习与试错。数字中国作为新时代国家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统摄性的指导方针,还是需要贯彻到每个社会结构中的元路径。中国传播学经历了单纯的引进转译、怀疑反思再到现今的探索自主体系,在持续明确自我主体性与方法论的进程中,仍存在需要扬弃的语境陷阱与二元形态的对立抗争,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中,不断地回顾与展望,扬弃与重塑;在学科历史、实践立场、媒介关系的路径中,坚定中国特色,找到属于中国传播学的价值空间。而所谓中国特色,正如高晓红等所指出的:需要在“中国发展、中国

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概念、中国范式”中寻求突破。^[77]

参考文献:

- [1] 殷晓蓉. 传播学历史维度的特点. 新闻记者, 2016, 3: 30-41.
- [2] 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224.
- [3] 鲍嵘. 学科制度的源起及走向初探.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4: 102-106.
- [4] 陈力丹.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际新闻界, 2005, 5: 20-23.
- [5] 胡钰, 陆洪磊. 从美国传播学发展历程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与路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 116-120.
- [6] 徐耀魁. 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纪念施拉姆来新闻研究所座谈 30 周年.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 4: 9-14.
- [7] 张哲瑜, 邵全红. 中国传播学 40 年: 一个本土化的视角与反思. 新闻爱好者, 2018, 8: 36-40.
- [8] 刘海龙. 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 文化冷战与现代化共识.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 6: 92-109.
- [9] 张涛甫. 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贫困. 新闻记者, 2014, 9: 48-53.
- [10] 谢宇.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社会学研究, 2018, 2: 1-13.
- [11] 谢清果, 王皓然. 中国传播学的“中年危机”与华夏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展望(2017—2021). 国际新闻界, 2022, 1: 61-80.
- [12] 邵培仁, 姚锦云. 返本开新: 从 20 世纪中西学术交流看传播学本土化.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59-68.
- [13] 郭旭东, 蒋晓丽. 从整体到多元: 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地方性视角.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 138-145.
- [14] 张桂芳. 本土化焦虑与方法论迷思——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 33-38.
- [15] 胡翼青. 大众传播学抑或大众心理学: 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再书写. 国际新闻界, 2019, 8: 38-51.
- [16] 周晓虹. 社会学本土化: 狭义或广义, 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 社会学研究, 2020, 1: 16-36.
- [17] 白红义. “平台逻辑”: 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 南京社会科学, 2022, 2: 102-110.
- [18] 戈尔. 数字地球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星球的理解. 地球信息, 1998, 2: 8-11.
- [19] 黄欣荣, 潘欧文. “数字中国”的由来、发展与未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 99-106.
- [20] 亨利·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36+139.
- [21] 郭华东. 数字地球: 10 年发展与前瞻. 地球科学进展, 2009, 9: 955-962.
- [22] 邱然, 陈思, 黄珊. “习近平同志看问题格局宏大”——习近平在福建(三十). 学习时报, 2020-08-24.
- [23] 何毅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学习时报, 2018-05-18.
- [24] 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 孙军悦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130.
- [25] 贺伟, 曹忍忍. 后实证主义的结构性与批判性——兼评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70-76.
- [26] 任剑涛. 从家国到国家: 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4: 192-208.
- [27] 燕继荣, 王江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 政治学研究, 2022, 3: 3-13+160.
- [28] 项飏.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开放时代, 2010, 10: 117-132.
- [29] S. H. Chaffee, M. J. Metzger. 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1, 4(4): 365-379.
- [30] D. McQuai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Paradigm Change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7(1): 216-229.
- [31] 吴飞. 数字传播与数字文明的兴起. 传媒观察, 2022, 1: 1.
- [32] 黄升民, 刘晓. 技术、数据、智能潮驱动下的媒介进化. 新闻与写作, 2018, 7: 41-45.
- [33] 喻国明. 5G 时代的传播发展: 拐点、挑战、机遇与使命. 传媒观察, 2019, 7: 5-7.
- [34] 方兴东, 严峰, 徐忠良. 5G 时代数字传播理论与机制研究——基于人类信息传播机制演变进程的视角. 新媒体

- 与社会,2020,2:17-33.
- [35] 胡正荣,姬德强.寻找新范式?中国传播研究的现实困惑与未来想象.文化与传播,2012,1:12-20.
- [36] 骆世查.作为实践的传播:一种数字媒介革命语境下的观照.新闻界,2018,1:74-80+93.
- [37] 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李婉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51.
- [38] 周勇.从元问题出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10:5-16.
- [39] 裴延宇.从基底到潜能——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原初质料概念.世界哲学,2019,4:43-50.
- [40] 梅琼林,连水兴.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三个关键词——从“学科互涉”到“学科规训”.学术研究,2011,7:137-141.
- [41] 张竹箐.传播学学科互涉的历史趋向研究——基于1937—2020年的学科共现分析.新闻界,2024,1:82-96.
- [42] 王金礼,秦艺丹.重塑传播研究的知识边界——美国《传播学刊》专刊“领域的躁动”的思想史解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8:47-53.
- [43] 约翰·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2:39-44.
- [44] 姜海,杨舒.中国式健康传播运动的双重话语与“国家”在场——以“送瘟神”为案例的讨论.新闻大学,2022,10:50-61+120+121.
- [45] 杜智涛,罗湘莹,苏林森.社会期待下的集体行动:媒介接触对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认知建构研究.国际新闻界,2022,4:53-77.
- [4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6.
- [47] 刘园园.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 将加强顶层设计.科技日报,2020-04-21.
- [48] 束开荣.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以媒介物质性为视角的个案研究.新闻记者,2021,2:39-50.
- [49] 刘海龙.奇妙的云与媒介诗学——评《奇云:媒介即存有》.信睿周报,2021-04-01.
- [50] 王继周.从“物”到“物质性”:媒介研究中一组概念的辨析.新闻界,2022,4:76-84.
- [51] M. B. N. Hansen.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 23(2/3):297-306.
- [52] 陈龙,孙萍.超级流动、加速循环与离“心”运动——关于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2021,4:29-37.
- [53] 孙萍,陈玉洁.“时间套利”与平台劳动:一项关于外卖配送的时间性研究.新视野,2021,5:109-116.
- [54] 孙萍,李云帆,吴俊燊.身体何以成为基础设施——基于平台劳动语境下外卖骑手的研究.新闻与写作,2022,9:28-38.
- [55] F. A.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39
- [56] A.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78.
- [57] 洪宇.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博弈式的国际融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108-113+128.
- [58]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2022-08-02. [2024-08-15] http://www.cac.gov.cn/2022-07/24/c_1660291721284309.htm.
- [59] 周尚意.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地理学报,2004,1:162-166.
- [60] G.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11.
- [6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30:4-27.
- [62]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87.
- [6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
- [64] 欧阳静.从“乡土性”到“结构混乱”——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3:138-141.
- [6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25.
- [66] 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2-39.
- [67] 邵培仁,夏源.文化本土性特点、危机及其生态重建——以媒介地理学为分析视野.当代传播,2012,2:19-22.

- [68] 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王海龙, 张家瑄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204.
- [69] 王琛元. 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概念、路径与启示.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5: 5-26+126.
- [70] T. R. Schatzki. *Social Practices: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o Human Ac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105.
- [71] 沙垚, 李倩楠. 重建在地团结——基于中部某贫困村乡村直播的田野调查. 新闻大学, 2022, 2: 84-96+120-121.
- [72] 易若彤. 差序格局与信任困境:疫情之下社区团购志愿者与居民的关系建构. 传媒观察, 2022, 5: 49-56.
- [73] 吴晓林. 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政治学研究, 2022, 1: 44-57+157-158.
- [74] 虞鑫, 兰旻. 媒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媒介角色——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政治. 当代传播, 2020, 6: 34-38.
- [75] 常江, 田浩. 泰瑞·弗卢:国家仍是媒介研究的核心维度——制度比较分析中的新自由主义迷思. 新闻界, 2019, 12: 4-10+16.
- [76]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10.
- [77] 高晓虹, 涂凌波.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创新与理论追求. 新闻记者, 2022, 5: 7-11.

“Digital China”: Path Selection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Localization Practice

Lian Shuix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 Jingwei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s been the core proposition and mission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s always been inseparable from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 Stepping into the new digital era, with the awakening of academic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many researchers,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y is trying to get out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compose the practice of discipline localization o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China” which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lore the “Chinese path” and construct the “Chinese discourse” to grasp the path selection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to study the trinity of “infra-structuralism”, “culture found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media embedd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people, digital objects and technical objects in the digital era.

Key words: digital China;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calization; China path

■收稿日期: 2023-03-05

■作者单位: 连水兴,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陈经纬,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汪晓清